

# 导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已进入一个新世纪，也正跨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21 世纪的经济既是一种知识为本的经济，又是一种金融化的经济。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在产业中的扩散，是 21 世纪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现代金融则使这种原动力以乘数效应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全球化态势已初露端倪，其主要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环节。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实施经济开放、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已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选择。开放一方面使这些国家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尤其以“东亚奇迹”最具代表性；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成为金融危机的多发地区。贯穿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1994~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 年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1997 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1998 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全部爆发在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正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危机国家货币贬值，证券价格暴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上升，而且有些还殃及到实体经济和社会安定，表现为企业大量破产倒闭，投资减少，人民消费需求减少，产出下降，失业增多，引发社会动荡。可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在以巨大的杠杆功能推进本国实体经济跳跃式发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财富漏出机制。那么，金融制度，尤

其是变迁中的金融制度如何影响实物经济，其具体的方式、路径和效应（积极的和消极的）如何？几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笔者选题的原因之一。

目前我们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的时代，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具有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特征。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工厂手工业时期，它所研究的主要是工业经济时代。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学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态势和路径尤其是企业成长路径的嬗变，是当代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原因之二是来自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相对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渐进式”特征，表现为在暂时不触动传统经济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增量改革来打破旧的制度均衡，以促进存量改革，实现经济的平稳过渡。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在企业内部先是在制度边界内通过放权让利，后是通过制度边界调整——企业制度改革，建立权、责、利的规制结构。在企业外部，先是以价格“双轨制”（或简称为“价格支持”来保证价格市场化过程中继续以较低的成本取得投入品供给，以实现转轨时期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但随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外）的基本市场化，“价格支持”这一暂时的制度安排已不具有适应性。这时绝大部分金融资本依然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它们服从于渐进改革的需要，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使国有企业能取得足够的信贷资金来购买资本品，于是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由“价格支持”转变为今天持续存在的“信贷支持”。“信贷支持”作为中国在渐进改革过程中一项特殊的银企结合制度，对于维护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高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信贷支持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由于金融资本长期按非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结果使政府、银行和企业陷入“三维”债务危机（财政债务危机、银行债务危机和企业债务危机）难以自拔，并在自增强机制作用

下，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正是由于信贷支持的收益递减而成本递增，20 世纪 90 年代初启动的股票市场，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支持”。可见，渐进式改革路径越来越倚重于金融制度。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的倾斜，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内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收益和效率，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部门也因为得不到正式的金融供给而受到影响，非国有经济自 1998 年以来的增速下降即是证明。可以想象，如果 20 年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生力军败下阵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堪忧。那么，如何选择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在中国加入 WTO 和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构建支撑企业成长的金融环境呢？同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世界范围内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的一种反应，物质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南鲍姆、林顿·拉鲁逊等对当今世界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倒金字塔”式的格局深感担忧。那么，金融制度对实体经济的“双刃剑”效应是如何形成的，其对实体经济的微观层面——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如何，怎样生成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企业效率成长的良性互动？对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索和求证，正是本书选题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 二、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成长的金融实质是企业追求实体价值最大化与虚拟价值最大化之间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对这一矛盾运动的历史描述和现实分析构成本书的逻辑主线：实体价值——虚拟价值脱胎于实体价值而显性化并作用于企业实体价值增长——虚拟价值脱离实体价值而过度膨胀——虚拟价值回归、收敛于实体价值。同时，以金融制度变迁为隐线，沿着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从适应性阶段到主动性阶段再到先导性阶段梯次演进的历史逻辑路径和从金融压抑到金融深化的经验路径，对比分析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

和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对企业成长方式、成长质量和成长速度的影响。金融制度的变迁和比较分析体现于企业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矛盾关系之中。

金融制度顺应经济发展并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表现为适应性阶段、主动性阶段和先导性阶段依次推进的变迁过程。在货币出现以前的物物交换时期，人们只是基于使用的需要进行交换，其流程是 C—C。商品的内在矛盾——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未取得显性表现。商品货币尤其是金属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价值形式取得了独立的表现形式，与商品的实物形式（使用价值的载体）相对立，商品的内在矛盾显性化了。在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时，人们交换的流程拓展为 C—M—C。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独立开来：C—M, M—C。资本主义企业作为通过生产经营获取价值增值的经济实体，主要通过内源融资获取资金，通过商品生产和销售获取价值增值。“适应性”金融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运营发挥的是定价功能（价值尺度）和中介功能（流通手段）。企业是实物流和货币流的复合体。实物流是货币流的使用价值载体，货币流是实物流的价值（价格）表现。货币流从属于实物流，作为实物流的流通媒介或价值体化物而存在。在适应性金融制度下，一方面，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商品（包括有形商品和服务、商誉等无形商品）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生产运营的风险由企业自身承担，呈现出风险个体化特征。

随着银行信用的出现，金融制度对经济的作用由“适应性”发展为“主动性”。银行信用的特征是货币信用化，表现为纸币依赖信用制度（国家、银行、法律）的支撑而代替金属货币成为通货。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关系与信用货币结合产生的货币信贷，使经济主体之间建立了复杂的经济联系，由单纯的买卖关系发展到债权债务关系。不可否认，在银行信用出现以前，经济主体通过商业信用等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业已存在。但只是在银行信用出现以后，它才发展成为一种重要而普遍的经济关系。在债权债务关

系中，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与银行信用相结合，使得商品交换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与其实体形式的关联度减弱。在此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资本主义企业运营的价值链条也进一步复杂化。企业融资方式中，除内源融资外，还出现了外源融资方式。可见，除了定价功能和中介功能，“主动性”金融制度还对企业运营中的货币资源发挥配置功能，使企业突破了自有资金的限制，可通过外源资金促进企业成长。依赖金融制度的支撑，企业在筹资、生产、销售等各环节节约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搜集成本，提高了生产运营效率。而这一过程的另一方面是，企业生产运营的风险也经由银行信贷提供的外源融资渠道溢出。投资者通过银行而间接地承担了企业风险，即呈现风险间接市场化特征。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制度的“主动性”作用是与货币信用化的过程同步的。这一过程从形式上表现为完全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纸币或票据等）取代了自身具有价值的金属货币；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和功能已发生了变化，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两重性。值得关注的是其独立性的一面，即货币在经济生活中逐步脱离实体经济形成独立形态和运行方式，构成了现代“虚拟经济”的初始条件。

随着股份信用的出现，金融制度对经济的作用由“主动性”发展为“先导性”。股份信用的特征是货币金融化。所谓货币金融化是指随着股份信用和随后的资本市场的出现，大量的货币转换为各种有价证券，包括股票、债券等，从实质上讲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因为如果说货币信用中的纸币和银行券所依据的是国家和银行的信用，那么，货币金融化所产生的股票和（公司）债券所依赖的则是企业的信用。但与货币信用化阶段不同的是，这些有价证券一方面代行货币的支付媒介职能，另一方面也逐渐发展成为交易的对象，并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交易定价机制。除了上述三种功能之外，“先导性”金融制度对企业生产运营还提供了套利功能，大量的金融资产已直接进入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成为

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至此，企业价值具有了两重表现形式：（实物）商品市场价值和衍生品（虚拟）市场价值。企业追求利润（价值）最大化有了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商品市场的开发创新、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实现销售额、利润率等指标的最大化；二是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达到融资成本最小，企业金融市场价格最大。

综上所述，在货币金融化条件下，企业具有两个身份证，两个价值尺度。一个是企业资产在商品市场中的价值，如资产额、销售额、利润率等实物价值指标，我们称之为企业的实体价值。另一个是从企业实体资产中派生出来的金融资产（本身没有价值，是虚拟资产）在金融市场中的价值，如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等价值指标，我们称之为企业的虚拟价值。

上述金融制度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变迁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抽象，也是对其历史演进逻辑的粗略概括。由这一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宏观层面，金融制度作用的变迁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内生决定的。建立金融制度是需要成本的。低的人均收入只能支付低成本的简单的金融制度，提供动员储蓄、分散生产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即中介和配置功能；而高的人均收入就可以发展复杂的、高级的金融制度，其功能涉及监督投资项目、估价创新成本与效率等，即套利和复杂的定价功能，相应地这种金融制度的运行成本也更高。可见，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阈限效应”，（R. Levine, 1992）。

在微观层面，金融制度的变迁引致了企业价值的二元化——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从本质上说，企业实体价值的实现反映的是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的生产者——企业与使用价值的需求者——消费者的矛盾关系通过实体价值实现的变化折射出来。具体说来，企业提供了受消费者欢迎的商品，所实现的企业实体价值就上升，表现为销售额、利润率等等的上升；反之，企业提供的产品不被消费者认可，所实现的企业实体价值就下降，

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所以，企业实体价值实现的过程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企业与消费者就产品的使用价值属性而展开的博弈。企业虚拟价值是指在金融市场（尤指股票市场）上形成的企业虚拟资产（股票和企业债券）的市场价格。从本质上说，虚拟价值是企业与投资者或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在股票价格上展开的博弈。二者不直接涉及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只是就货币资本的收益性和安全性进行谈判和博弈。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框架的构造构成本书的基础理论部分也就是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的内容。

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虚拟经济市场和实体经济市场形成了二元市场格局。虚拟经济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表现为在宏观方面扩大储蓄和投资总量，改善资源配置、增加社会福利；在企业方面表现为便利融资，促进企业治理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水平、投资效率和技术创新等。但是，在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使得企业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背离，又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是一个价格机制，即通过反映供求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配置。实体经济市场和虚拟经济市场形成了两个价格信号。从理论上讲，两个市场的价格处于收敛状态，它们综合反映生产要素和资产的供给状况和配置效率，共同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两个市场的价格信号经常处于发散状态。尤其在虚拟市场出现过度膨胀时，金融市场价格信号会扭曲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或误配置，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新兴工业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由此可得到一个解释。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决定了企业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从理论上讲，实体价值决定虚拟价值，企业在商品生产经营中的业绩决定其股票的市场表现。虚拟价值也影响企业的实体价值，如，企业进一步融资、企业知名度等。但二者又是相互独立的，有着独立的市场运行规律和定价规律。企业的虚拟价值有时会背离其实体价值，其根本原因在于虚拟价值的载体

——虚拟资产（资本）。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虚拟资本自身的虚拟性，二是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虚拟资本交易的投机性。我国股市上曾出现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市盈率即是虚拟价值背离实体价值的明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分析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探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效率效应；第五章揭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导致的金融异化和金融泡沫及其安全效应；在此基础上第六章从动态角度考察企业成长与金融制度变迁的互动性，探索导致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差异的金融动因。

在金融经济（货币资本化）背景下，企业作为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其成长的过程是追求实体价值最大化与虚拟价值最大化之间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理性的企业成长应是以实体价值为基础的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的共同增长——效率型成长。这也应是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和金融创新的效率定位和安全定位所在。对企业成长和金融发展的定位分析构成本书的第三部分，即第七章的内容。

### 三、分析方法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试图融合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深化对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

贯串本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的哲学基础是辩证的二元论，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一元论，把一切研究对象约化为单一元素——“效用”。我们认为，事物是在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中运动和发展的，是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

① 张曙光将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十分精炼地概括为：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理性主义前提、经验主义内容和实证主义方法（张曙光，1997）。

面的相互转化中演进和变迁的。因此，本书沿着企业追求实体价值最大化和虚拟价值最大化之间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这一主线展开，试图用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这一对矛盾范畴，来揭示企业成长的金融实质，探索企业价值二元化的历史演变、互动和效应。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sup>①</sup> 本书在研究上正是运用了抽象的方法。抽象法遵循的是从实际出发，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本书从企业这个社会经济最基本最具体的单元出发，来探讨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而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思维流程正好相反。其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一般到特殊。这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因此，本书从企业、企业成长一般切入，对有关企业组织的历史演变，企业成长、企业边界的理论进行梳理与评析。这里舍象掉金融因素，分析企业作为实物经济变量的集合或契约组合，其实现成长的方式与限制。然后将金融因素纳入分析，探讨企业成长的金融制度条件。其中，首先将金融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一般性地分析金融成长与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宏观层面的开源效应与互补效应，及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与激励效应；其次，将金融制度视为内生变量，分析从长期看金融制度与企业成长、经济发展的互动与共生关系。本文正是通过对各种约束条件的逐步放开，将理论问题的关注逐步融入对现实问题的讨论。

科学的意义在于探索客观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所谓的相关性。面对色彩纷呈而又混沌难辨的现实世界，理论科学就是要探索和思辨其内在的规律，形成合乎逻辑和符合经验的价值判断，这正是相关性研究之要义。相关性研究作为经济学中运用越来越普遍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先将两项或多项可能相关的经济现象之间通过一些假设或假说建立起一定的关系，然后再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 页。

分析，从而揭示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笔者运用相关性研究方法提出和验证了“企业价值的二元化——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假说。既有的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二者的渊源与互动关系，而没有深入到微观层面，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微观基础的讨论还不多见。为试图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笔者采用相关性研究方法，对影响企业成长的各个重要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为研究企业成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 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2) 陈文玲：“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世界经济》1998.3；3) 陈文玲：“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管理世界》1998.6；4) 秦晓：“金融业的异化和金融市场中的虚拟经济”，《改革》2000.1。

# 第一章

## 企业成长的经济学分析

在人类社会变迁的漫漫长河里，经济学以“经帮济世”为己任。面对人类提高福祉的无穷愿望和可用资源的相对短缺这一永恒的矛盾，经济学者一直在寻找一种令人满意的体制或机制，有效地分配资源，使其既能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又能使财富收入在分配上保持相对公平<sup>①</sup>。自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虽然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分支、派别不断增加，各种学术观点迥异，但始终没有脱离有效配置资源这一主题。而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就是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或帕累托规范（Pareto criterion）：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情况的改变使有些人感到好些而不使至少一个别的人感到坏些，才算是社会福利的增加。在一定市场条件下，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个体利益最大化是统一的，因此企业（厂商）和企业成长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细胞”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十二版中说：目前，经济学者同意一个类似下列的一般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适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和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参见 [美] 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著《经济学》（上），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中译本，第 4 页。

## 第一节 企业成长的理论发展：一个综述

企业成长是历史的演变，也是现实的活剧。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欧美经济中，承担生产和市场分销活动的工商企业还只是传统的业主或合伙式企业，企业的规模狭小，业主们事必躬亲地处理企业的各项事务。而 1840 年之后的 100 多年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的广泛应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一些现代企业乘势而起，实现了企业成长的历史性跨越：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的家庭式企业向巨型公司演进，同时伴随着企业理念、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全面变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知识经济时代进程的加快，企业的生存与成长正呈现出崭新的态势。人们普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许多企业通过网际网络销售自己的技术、品牌与商品，并且借助于股票市场的资本化而傲居世界大企业的前列。同时并存的一个现象是，企业的平均寿命缩短了<sup>①</sup>。很多名噪一时的大企业在风云过后，纷纷退出历史舞台。

理论是实践的洗印和提升。对企业组织变迁历程和成长机理的追溯与探讨，就构成了企业成长理论。企业成长 (Growth of the Firm) 属于微观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研究范畴。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微观经济的细胞，是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将企业的本质解释为生产函数，其惟一特征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黑箱企业”理论的不满和反思，诞生了一系列以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团队生产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理论。这些理论从两个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理论的假定。第一个方面是否定了交易

<sup>①</sup> 在美国，平均有 62% 的公司存活不到 5 年，寿命超过 20 年的公司只占公司总数的 10%，只有 2% 的公司可能存活 50 年；美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只有 10% 能活过 5 年。1970 年名列美国《幸福》杂志 500 名的大企业，有 1/3 到 1983 年时已经消失了。参见周德孚等：《学习型组织》，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成本为零、参与成本为零的新古典假定，将交易成本为正作为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条件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之中。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是，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对人与自然（资源配置）关系的研究扩展到人与人（契约关系）关系的剖析，从个人交易行为的角度理解企业，将企业看做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点，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成员博弈的结果。广义的企业成长理论包括企业起源（形成）和企业发展（即狭义的企业成长）两个方面。其中关于企业起源和形成的理论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迅猛的一个领域，学派林立，具有代表性的有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学派、不完全合同理论、信息经济理论、声誉观点和企业的“知识理论”等。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对此不展开分析，而直接将狭义的企业成长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

成长这一概念的英文是 Growth，中文可译为发展、成长、发育、增长、增加、增大等。在经济学中，多用增长一词，如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增长经济学（Growth Economics）。在管理学中，则多用成长一词，如成长战略（Growth Strategies）、成长曲线（Growth Curve）、成长期（Growth Stage）。成长本身是指增长与发展相互关联的状态。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曾作过形象的说明：“正如在人类身上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强调发展则侧重于机能上——素质协调的改变，例如指学习能力（或者说经济上的适应能力）”<sup>①</sup>。狭义的企业成长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扩张以及企业扩张与其他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关系两大主题。前者主要包括企业成长的概念、动因、类型、途径、（边界）条件和政策建议等；后者则发散性地涵盖了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如企业成长与产权制度、企业成长与金融制度、企业成长与管理组织制度、企业成长与部门经济、企业成长与产业结构、企业成

<sup>①</sup> 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中译本，第 5~6 页。

长与经济增长等。

具体的企业成长研究视角具有深刻而广泛的跨学科性质，且种类繁多。依据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我们将企业成长理论分为以下几种。

## 一、技术维度的分析 (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企业成长的阐释。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繁荣时期，是工业经济的“青少年”时期。在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由于工业经济仍然依附于农业经济，所以生产要素被简化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位一体”公式，而引导商品生产者为了自身利益进而满足社会需求的机制被抽象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对此有明确的论述：“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付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限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地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sup>①</sup> 换言之，也就是“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的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sup>②</sup> 在亚当·斯密看来，“看不见的手”不仅能够使企业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也会使社会效益达到最佳境界。然而从根本上说，斯密的结论只是猜测性的，对于市场怎样实现资源在各种需要之间的有效分配并没有给出严密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 1974 年中译本，第 27 页。

<sup>②</sup>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 1974 年中译本，第 26 页。

的分析证明。完成这一使命的是 1870 年前后的边际革命，有三位学者，即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以及瑞士的瓦尔拉，同时而独立地为能够综合效用和成本因素的经济分析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瓦尔拉深奥的数学分析，一般竞争均衡的分析得以完成，从而成功地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内核形式化了。由边际革命而发端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正是交通运输、采矿、电磁等技术大幅度提高进而使石油等新的矿产资源和电力进入工业生产的时期。在新古典经济学为承袭和反映工业经济的根本变则而构造的经济模型中，除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外，还出现了资本市场。在这个资本市场中，资本是指实物资本，即资本家占有的、可用于生产投入的实体物质，其实质是以自然资源及自然资源加工后的产品为主的资源——生产要素。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关心实物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关心实物产品的交换和消费，关心实物资源的有效配置，从根本上说属于实物经济学<sup>①</sup>。

因此，在古典、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下，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决定于价格、产出、广告费用等少数几个变量。在生产技术、投入和产出的竞争市场价格给定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按利润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对投入和产出水平进行选择。由于生产中一些固定成本独立于产出水平，所以在可变成本随着产出增加而提高时，平均成本会出现下降趋势，产生规模经济。但是，到了某一点之后，因为某些投入如经营能力很难随着企业规模而改变，原有的有利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反转，甚至可能出现规模不经济。由此可见，不同行业的企业由于生产工艺、市场需求及要素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都存在一个不同的最佳经济规模。

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萌芽和成长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企业成长理论的历史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与机器大工业同属于一个时

白钦先：“再论以金融资源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国际金融研究》2000年第2期。

代。该时期的企业实际就是工厂，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工厂组织。随着工厂的技术所容许的生产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平均生产费用的递减现象，被称为工厂的规模经济。工厂规模的扩大，首要的得益于生产工艺的重大革新所产生的“其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前未有的成本优势的潜力”<sup>①</sup>。正如钱德勒对 19 世纪最后 25 年的大企业所描述的那样：“在老的、劳动密集的工业里，制造企业产量的增加主要靠增加更多的机器和更多的工人来开动机器。在新工业里，产量的扩大靠资本劳动比率的大大提高。这就靠改进投入并重新安排投入；靠使用新的或大大改进了的机器、锅炉、蒸馏器和其他设备；靠在工厂范围内将生产程序重新定位；靠设置若干个中间工序，用于在单一个工厂内制造最终产品；并且靠增加应用能源（特别是石油的能源）。”<sup>②</sup>可见，工厂的规模经济，或最佳（最优）工厂规模的性质，多为生产技术性规模经济。由于现实中企业的不断成长，经营多个最优规模工厂的企业形式逐渐成为普遍的、主要的现象。企业和工厂的分离，突破了工厂的规模经济所提倡的理论模型，而转向了对企业（多工厂的企业）规模经济的分析。对此我们后文将展开分析。

技术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将企业置于投入产出的效率分析，侧重于企业内部的成本计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卖方市场背景，经济发展还处于供给主导阶段；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主要经由生产性努力，建立的是人与自然的函数关系。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因

<sup>①</sup> 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中译本，第 23 页。

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中译本，第 24 页。

人类追求财富是通过两种努力方式来进行的，即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所谓生产性努力是指通过生产领域、服务领域取得财富的行为；所谓分配性努力是指通过支付、继承、转移、藏匿等手段取得财富的行为。参见金晓瑜、沈卫平：《企业·市场与制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17 页。

素相对固定，技术水平便成为影响财富生产数量的关键因素。所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一般意义上强调技术的作用，在特定意义上强调规模经济的决定作用，现已成为分析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最佳规模的测度、定量分析的困难性<sup>①</sup>。二是忽略了非技术因素起因的节约，如梯罗尔（1988）就指出，物质或技术方面的节约仅仅是一体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sup>②</sup>。而来自现实世界的一个挑战是，在网络经济时代，规模收益边际递减规律将让位于规模收益边际递增规律，<sup>③</sup>企业凭借网际网络和电脑操作平台享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企业成长的技术动因又如何体现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经过历史发展累积而渐具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金融制度，日益成为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变量，进而使企业成长具有了全新的性质和效应。而新古典的实物经济学属性对此难以做出有力的解释。

## 二、制度维度的分析（institution dimension）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通常被当作假定条件或外生变量而相对被忽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才开始渗透到制度方面<sup>④</sup>。经济学者对于“制度”的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制度研究，并且正是依靠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即制度的分析而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和政治上的吸引力。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制

乔治·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中译本 第 39~40 页。

梯罗尔：《产业组织理论》剑桥出版社 1988 年版。

洪银兴：“新经济的经济学分析”，《新华日报》，2000 年 7 月 3 日第 C02 版。

这主要是以贝克尔（Gary Becker）为首的关于家庭经济学的研究，即说明家庭制度如何影响消费结构。由此可以认为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从交换、消费的方面开始关注、研究制度问题。